

俄罗斯发展 30 年

俄罗斯政治发展 30 年： 特点、成效与前景

薛福岐

【内容提要】2021 年是苏联解体 30 年，也是俄罗斯联邦作为国际法主体登上国际舞台 30 年。转型以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重建且不断固化，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断强化，政治发展呈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俄罗斯目前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互动模式能够满足大资本和依赖国家的大多数民众的诉求，国家主义与父爱主义相互建构，相互强化，但与俄罗斯社会存在的变革诉求存在明显张力。从绩效角度，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关系，足以维持政治社会稳定，但却一直没能解决发展问题。政治发展连续性的经济社会后果就是不发展或者发展缺失，这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俄罗斯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重大风险。

【中图分类号】D73/7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21）06-0022-0016

【关键词】俄罗斯 政治发展 单一中心
政治权力 发展缺失

【作者简介】薛福岐，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创新工程项目“欧亚地区战略态势：2019—2021”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承苏联的核武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作为国际法主体登上国际舞台，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完成制度转型，其标志是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其设定的一套完整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俄罗斯此后的发展是在这一新制度框架内进行的。

目前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对俄罗斯政治转型是否完成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认为，至少从东欧国家的经验角度，政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至少发生1次的政权轮替，反对派执政，从而表明新制度的运转是正常的，没有发生逆转和回潮。俄罗斯的情况则是，1993年迄今经历7次例行总统大选（分别是1993年、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8年），但赢得大选出任总统的三位政治人物均来自同一个政治精英集团，并未发生反对派胜选执政的情况，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俄罗斯政治转型未完成？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前提不同。东欧国家内部在苏联解体前就已经存在强大的反对派力量，如波兰的团结工会等。在俄罗斯，虽然在苏联时期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但在新制度下执政的则是来自原体制内部的政治精英。在一定意义上，政权轮替只是制度转型完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第二，转型范式的固有缺陷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目的论。转型范式具有十分明确的标准，那就是非西方政治体只有在完成西方式政治制度建设之后，才能被认为是完成了制度转型。换言之，转型意味着以西方制度为判断标杆，并且赋予西方政界和学界对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评判权和认定权。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学者也认为转型范式是站不住脚的。譬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卡罗瑟斯就认为，全球范围的大量实例证明，民主转型范式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现象，因此应该予以放弃^①。

第三，如果仅从俄罗斯没有发生转型完成的标志性事件作为评判标准，那么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论述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窘境。即为什么俄罗斯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模式，回答是转型未完成。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转

^①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2002. no. 1.

型未完成,所以俄罗斯还没能发展出西方式的制度。笔者曾经有一个时期受转型范式影响也认为俄罗斯处于制度转型未完成的“中间状态”。事实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政治制度也不例外,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据此认为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在特定时间段都处于某种“中间状态”,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我们需要给俄罗斯制度转型画一条分界线,那就是 1993 年通过的新宪法,标志着俄罗斯从一种社会制度转换到另一种社会制度,新制度确立并进入实际运转,政治转型已经完成。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1991 年以来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这个研究题目极其宏大,内涵十分丰富,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不是对这个时期俄罗斯政治进行全景式分析,而是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俄罗斯新制度框架内的政治发展及其绩效问题上,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概念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发展进行概括和总结,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二、政治发展：概念界定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俄罗斯新制度框架下的政治发展及其绩效。因此,首先有必要对政治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

政治发展作为政治学概念和研究范畴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最初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端于 20 世纪 40 年代,兴盛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研究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地区许多殖民地获得独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新兴国家在建国过程中,遇到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诸多难题,步履艰难,内乱频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政治发展理论应运而生,旨在对新兴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①。

中国学者对政治发展概念进行了拓展,如燕继荣、曾庆捷、杨光斌、杨龙以及陈鸿瑜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架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命题^②。其中陈鸿瑜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

① 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沿革与演进,燕继荣、曾庆捷、杨光斌、杨龙、陈鸿瑜等人都有专门论述。

② 详见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曾庆捷《发展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杨龙《发展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版;等等。

增强，社会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①。在这里，政治发展被理解为一个逐步完善的连续的过程，并且总体上是趋于理性和良性的。

我们认为，对政治发展这样一个政治学研究当中广为人知、约定俗成的重要概念，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当然，可能先要对“发展”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澄清并在新的基础上赋予其新内涵。

《辞海》对发展的定义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上升的变化过程^②。显而易见，这里对“发展”的理解蕴含着显著的价值判断，即认为发展有着积极的、正面的含义。作为哲学范畴，这种含义完全是恰当的。但是，当我们将这个概念不加批判地直接应用于政治学研究时，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便变得不可避免，这意味着政治发展应该是积极的、向前的、向上的，政治发展本身蕴含着某种“善”。

问题在于，当我们讨论特定政治体变迁过程时，将其“发展”理解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进而趋于完善这样一个线性过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从经验角度，许多政治体的发展都不具备这种线性特征。在政治实践中，发展本身是复杂的、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其结果是非决定论的，可能有多个面向。

进而言之，可以参考演化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将政治系统看作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其演进的路径是一个具有多个分岔点（Bifurcation point）的“树状结构”（而不是一条直线），系统就在这些分岔点上对这些可替换的、概率相同的道路进行选择。哪条道路被选择是不可预言的，结果因而是非决定论的^③。如果我们将政治系统理解为一个自组织的演化系统，那么它的发展就是按照一种不连续的机制运行的，是在一个不可逆的时间尺度中发生的。政治系统的稳定是在运动变化中创生出来的，且永远与导向混沌无序的衰败相伴随。而产生突变的内因是政治系统的功能失调、结构失衡、权力失控等多种因素。同时，产生突变的外因普遍存在，并且政治系统的整体特征也十分重要。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新定义：政治发展指的是特定政治体之内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的内涵涉及多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

① 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6—27页。

②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6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③ [德]克拉默：《混沌与秩序：生物系统的复杂结构》，柯志扬、吴彤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135页。

力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与社会及其结构相互塑造、相互建构，并且这种互动方式是非线性的，其结果是非决定论的，因而可能呈现出多个面向：既可以表现为连续性的持续互动（不一定是稳定），也可能表现为不连续性的政治衰败和发展中断。苏联解体就是发展中断的例证。

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存在两种可能的方式：“管制型”和“合作型”。所谓管制型，指的是“全知全能”的政治权力生成发展的动力，发出信号，动员资源，灌输给社会，并要求社会无条件遵循，是自上而下的“单行线”，且不接受反馈或者反馈渠道是“虚设”的。政治系统是在官僚系统之内封闭运行的。社会获得的有关知识是经过筛选的、片面的、有导向性的。管制型的要义是灌输、管制与内在的紧张和互不信任。所谓合作型，不一定是自觉自愿的，而是政治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制约，不得不公开运行。社会有能力以及条件将自己的诉求传达给政治权力并将其变成政策和法律，双方的互动是上下相通的“双行线”。合作型的要义是协商与妥协以及有条件的信任。

此外，我们尝试着以简化的方式来描述和展示政治权力与社会互动所表现出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内涵及其结果（见表 1）。

表 1 政治权力与社会的互动：连续性与不连续性

面向	内涵	结果	说明
连续性	政治权力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在既定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	政治体系的持续运行	表现为政治稳定
不连续性	政治权力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人事和政策路线调整、领导人个人偏好改变、政权更替等	政治体系的基本前提、框架、人事、政策路线及领导人个人偏好等发生改变，引发政治危机，政治体系在“分岔点”脱离原有秩序	既可能导向连续性即政治稳定，也可能导向衰败甚至发展中断
发展中断	系统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无法得到解决	政治体系崩溃	例如苏联解体

资料来源：作者本人制作

在现实政治中，政治体系很少能够在较长时间范围内保持不变。多数情况下，政治权力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如果这些矛盾和冲突能够在既定框架内得到解决并且解决方式是基于某种共识，其结果大体上被接纳，那么政

治体系的运转就会获得连续性。然而，不连续性的情形对理解政治发展更为重要。这里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矛盾和冲突暂时得到缓解，以隐性方式继续存在，政治体系的运转在表面上获得连续性；另一种则是矛盾和冲突未能得到解决，或者解决方案是政治权力强加于社会，这意味着矛盾和问题不断累积，政治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危机不断，发生政策路线的改变、人事变动甚至政权更替等，并在极端情况下导致发展中断。应该说，发展中断属于极端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体系在其内部矛盾与冲突解决的过程中不断演化，不连续性使其在关键的转折点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体系的基本前提与内涵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形式上依然大体保持原有的框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权力与社会互动的内涵，正是特定政治体内部政治生活的全部内涵并归结为国家治理的绩效，涉及合法性、政治参与、政治动员、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与运用等等。

总之，本文对政治发展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简单梳理，并尝试提出一个新的定义，其主要特点是，政治发展被从一般进化意义上加以理解，被看作是一个动态和演进的过程，而不是所谓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线性特征，其结果也因此呈现出多个面向：连续性、不连续性（衰败与停滞）及发展中断等。与此同时，限于篇幅考虑，本文有意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外部因素以及政治体的整体特征等重要问题存而不论。本文旨在从一个全新的政治发展概念出发，从政治权力与社会的互动方式研究和分析俄罗斯在新制度框架下的政治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治理绩效及政治制度的发展前景。

三、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与特点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根据前文给出的定义，分别从资本、地方势力、东正教会、新闻媒体等角度重点探讨俄罗斯政治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首先需要确立新的政治制度，组织政治权力，也就是进行治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政治权力与社会及其结构之间相互建构，政治权力获得合法性以及相应的社会基础，社会则通过政治参与、政治动员与政治权力发生互动。因此，讨论俄罗斯新制度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必须首先探讨政治权力及其来源与性质、组织方式、运行方式等特点，然后才能涉及绩效问题。

（一）俄罗斯政治权力的类型：单一中心政治权力

俄罗斯新政治制度的确立首先是新的政治力量构建政治权力的过程和结果。因而新制度框架下政治权力的性质，也是观察新的历史条件下俄政治发展的视角。

这里涉及俄罗斯新制度的初始条件。从政治精英来源角度看，1993 年之时俄罗斯新的政治精英来源于旧体制内部，其人际关系网络也是在旧体制时期建立起来的，在权力体系运行乃至国家治理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政治转型方面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新的掌权者并不是原来的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来自原体制内部。

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苏联政权内部一部分人从上层发动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这也是我们在讨论俄罗斯政治转型问题时必须考虑的“语境”和出发点。安·利亚波夫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相对清晰的分殊，即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媒体、军队和商业精英。相比而言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精英缺乏类似的分殊，因为它从官僚精英脱胎而来的^①。

当然，从时序角度看，从 1991 年苏联解体到 1993 年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其间经历了十分激烈的政治斗争。关键在于，1993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宪法，从权力分配角度虽然设计了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但却构建出被称为“超级总统制”的权力结构，即总统地位超然于三权之上，几乎等于一个单独的权力分支。因此，我们认为，通过 1993 年宪法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俄罗斯基本上重构出一个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内容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

这里所谓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单一来源及其独占性是与欧洲诸国相比较而言的，同时也是俄罗斯与欧洲相比大异其趣的根本所在。以西欧国家为例，在现代国家构建完成之前的中世纪，有代表政治权力的国王，有代表神权的罗马教廷，有代表经济权力的商人，有掌握武力的骑士，有掌握土地资源的贵族。如此，国王、贵族、教士、商人构成多个权力中心，彼此之间有竞争有斗争，同时也有谈判与妥协，总之权力中心的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②。

对俄罗斯而言，这样一个“单一中心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逻辑。根据历史记载，公元 862 年，诺夫哥罗德贵族决定邀请留里克担任大公。

^① Andrei Riabov. The Post-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Russian Political and Law*, vol. 52, March-April 2014. no. 2.

^② 朱天飏：《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23 页。

原因是，诺夫哥罗德以及邻近地区的俄罗斯人无法就从内部推举统治者达成妥协与共识，因为大家的立场是一样的：“舍我其谁”，因此最终决定邀请一直劫掠俄国人的北欧海盗来做统治者。一方面，此人与当地人之间没有利益关联，另一方面，留里克兄弟作为统治者则会将连同劫掠所得留在当地^①。从一定意义上，诺夫哥罗德的俄罗斯人邀请留里克兄弟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事实上，这个故事与奥尔森的国家观^②（“常驻的匪帮”与“流寇”）有相当高的契合度。奥尔森认为国家的本质是掠夺性的（而非为了善或者正义），但有的匪帮是流寇，其手段是烧杀劫掠，一次性获得最多的战利品，而常驻匪帮则选择收取最大化的保护费（税收），并保护人民不受其他匪帮劫掠，从而成了国家。

俄学者将俄罗斯政治权力的单一中心特征概括为政治权力的综摄性，即权力与资产一体，知识与评价一体，神圣俄罗斯与国家与人民一体^③。就其性质而言，“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天然地排斥政治竞争，无论竞争来自宗教权力、经济权力（资本）还是地方势力。我们认为，“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是俄罗斯政治发展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因而我们探讨的也是“单一中心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二）政治权力与社会的互动

30年来，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的恢复重建及其强化，构成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主线和基本内容。主要涉及政治权力与资本、教会、地方势力、大众传媒及社会的互动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与操纵。

1. 政治权力与资本

1993年新的政治制度确立之后，俄罗斯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最短时间内重构社会经济基础，而大规模私有化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俄私有化过程十分复杂，而私有化的结果则是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及对资源分配权的高度垄断（集中）^④。

俄罗斯的私有化在1996年前后达到高潮，新的寡头势力迅速形成并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关键因素。在1996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寡头势力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而2000年之后打击寡头势力的结果是，俄罗斯大型私人企业继续获得

①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Б. Ю., Сергеев В. 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иротестовый анализ. Изд. Стрелитип. М.: ЛЕНАНД, 2021. С. 36.

② 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比较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③ См.: Яковенко И. Г. Росс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1990-е годы и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период: соци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М.: Новые знания, 2014. С. 8.

④ Макаренко Б. Рамки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Pro et Contra. 2012. № 4-5.

国家支持，作为交换，他们不能支持任何未经官方允许的反对派力量，同时要积极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社会项目。有研究显示，除 20 世纪 90 年代崛起的“旧寡头”之外，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新寡头，其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更为密切，获得政治支持的途径更为直接，同时对政治权力的依附程度则更高。当然，在实证意义上，俄罗斯政治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但无论如何，政治权力实现了对资本力量的“驯服”，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苏联解体和新制度“植入”的结果，不是某种混合体制，而是形成一种称为“后苏联资本主义”的体制。其根本特点是，权力和资本相互贯通并且高度集中在少数相同的精英手里。事实上，新出现的是一个单一的“权力-资产”制度安排。而“权力”和“资产”的掌管者就是国家官僚^①。

2. 政治权力与东正教会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当局对宗教，尤其是东正教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为弥补东正教会在苏联时期受到的损失，俄罗斯政府甚至为其特批某些特种商品的进口配额，东正教会则借此与商人合作，获得可观收入^②。自 2000 年起，俄罗斯当局不断发出信号，东正教会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教会且受到国家的支持。国家领导人亲自出席重要的宗教节庆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普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东正教徒身份。2000 年以来，东正教被逐步作为国教，国家与宗教的紧密一体使俄罗斯社会回到斯大林时期那种明晰的局面：一个上帝、一个真理、一个神性权力。

3. 政治权力与地方势力

在苏联解体之前与联盟中央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叶利钦面对地方实力派做出的承诺是“能消化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以此作为换取地方实力派支持的条件。在 1993 年宪法框架下的制度设计中，俄罗斯联邦会议上院，即联邦委员会由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首脑组成，许多联邦主体尤其是民族自治区都通过了自己的宪法，明确宣示自己的主权，经直选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往往有实力和底气与叶利钦一争长短。后续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俄罗斯大幅度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新的进展是，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但候

^① Andrei Riabov. The Post-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② Яковенко И. Г. Росс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1990-е годы и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период: соци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е измерение. С. 21.

选人往往由联邦中央“空降”且大部分定位为技术官僚，不再具备政治影响力。因此，俄罗斯宪法确定的联邦制往往被看作是事实上的单一制，不无道理。笔者曾数次到访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了解到的情况是联邦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人员数量多于当地政府的雇员数量。

4. 政治权力与大众传媒

值得说明的还有政治权力对媒体的控制，其中主要是控制电视媒体，通过电视对社会舆论进行塑造、引导与操纵。一般而言，俄罗斯民众对特定国家的态度与电视的传播导向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关联性。其中的关键在于，电视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年长一代，而电视的受众与民意测验的受访者群体之间有一定的重合。与此同时，这部分群体也是活跃的选民。因此，通过电视影响社会舆论、进行选举之前的政治动员，对当局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5. 政治权力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和政党格局

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祖巴列维奇根据2011—2012年选举的投票结果显示出的不同地区选民的投票行为，将俄罗斯分为四个类型，提出所谓“四个俄罗斯”概念^①。“第一俄罗斯”指的是12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加上2个人口接近百万的城市，占全俄总人口的21%。近20年来，这14个城市除4—5个之外居民就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白领”比例大大高出技术工人“蓝领”。俄罗斯3000多万中产阶级和网民主要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第二俄罗斯”指的是中小工业城市（人口从2万—3万到30万—50万，最多到70万人，约占全俄总人口的35%）。居民依然保持苏联生活方式，就业结构主要是“蓝领”，中小企业不发达。“第三俄罗斯”指的是广大小城镇和农村，约占全俄总人口的38%。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政治上处于被动状态。“第四俄罗斯”指的是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等边远地区，约占全俄总人口的6%，当地经济和居民收入主要依靠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

还有俄罗斯学者从社会意识角度划分出“三个俄罗斯”，即处于后工业社会21世纪的俄罗斯、处于工业化时代20世纪的俄罗斯以及遵循传统价值的19世纪的俄罗斯。

无论是四个俄罗斯还是三个俄罗斯的划分，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苏联时期

^① Зубаревич Н. Наталья Зубаревич: Четыре России//Ведомости, 30 декабря 2011. https://www.vedomosti.ru/opinion/articles/2011/12/30/chetyre_rossii

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均质，俄罗斯独立后，这种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并急剧分化为极少数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以及介于其间、处于相对少数的中产阶层。政治权力与大资本是贯通的，而接近一半的就业人口直接或者间接属于依赖于国家财政部门，如政府机构、官办企业、依赖政府采购的大型私人企业以及大型能源企业等的从业人员。这部分居民实际上构成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基础。

因此，一方面是国家在经济中的存在不断扩大（国家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父爱主义”（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等靠要”心理），二者的关系表面上似乎呈现为相互建构、互为前提，但事实上国家实施的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路线，与国家在经济中的存在不断扩大相伴随的是其从社会领域的不断退出。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从社会意识的角度看俄罗斯社会存在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即依靠国家的大多数和少数的经济上自主、政治上独立的城市中产阶级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经济和社会政策导向^①。对前者而言，希望政治稳定，有秩序，国家不断增加工资和退休金。对后者而言，政治稳定和秩序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制度（涉及腐败、透明、效率等等）。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需要国家提供公共品。虽有重合之处，但区别更有实质意义。

一般而言，在任何一个社会，意识形态都可以想象为一个从左（极左）到右（极右）的连续光谱。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应该是由偏右翼的少数、微不足道的中间派和占绝大多数的左派组成，总体上偏左。而这样的意识形态构成在理想状态下对应的政党格局应该是占多数的左翼政党、为数不多的中间派以及少数右翼。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国家杜马，则是拥有着宪法多数的中间派（统一俄罗斯党）以及为数不多的左翼（俄罗斯共产党），加上一些民族主义右翼力量（自由民主党）。

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当局的政党建设与选举制度，都是围绕着如何化解上述局面展开的。这就涉及政治权力对社会意识的主动建构，主要手段就是未曾明言的“社会契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目标无疑是对照欧洲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标准，快速实现新制度与新社会的构建。2003—2013 年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最为富足的十年，石油价格高企再加上市场化改革，使得俄罗斯民众成为二次分配的

^① От плебисцита - к выборам. Как и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не голосовали на выборах 2011-2012 гг. Под ред. Валерия Федорова. М.: Изд. иконсалтинговая группа «Практис», 2013. С. 6.

受益者。2014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本国版图，爱国主义由此成为最大公约数。2020年以来，“维持现状”及与西方关系紧张则成为新的话题。

（三）绩效：稳定与发展缺失

治理绩效则可以从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维度进行观察。对于任何政治体制或者制度而言，衡量其质量的关键是从经济发展维度观察其治理绩效。经过30年的发展，现在俄罗斯的状况如何？

首先是政治稳定。正如前文指出，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举行7次总统大选，获胜的均是当局推出的候选人，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和绝大部分地方议会拥有多数席位甚至宪法多数席位。在俄罗斯，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加上政治权力对民意的塑造与操纵，对宗教和传媒的控制等等，无疑对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局面则有所不同。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占全球11.4%，拥有世界20%的自然资源，人口为世界总人口的2%，发展经济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此外，俄罗斯74.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识字率达到99%，超过半数居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与以色列、加拿大处在同一水平），大多数居民从事非体力劳动，人力资源的质量很高。应该说，最近30年俄罗斯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与苏联时期相比有了长足的进展。苏联时期商品短缺问题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享有出国旅行以及国内迁徙的自由。

与此同时，有关研究显示，自1991年以来的30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左右，远低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30年来，俄罗斯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了34%，也就是年均接近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俄罗斯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目前，俄罗斯10%的富人掌握全国83%的财富，而其中1%的富人则掌握全国60%的实物与金融资产（在美国，1%的富人掌握全国35%的财富）。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俄罗斯亿万富翁（103人）掌握全国财富的30%—35%。同时贫困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目前约有2000万人的收入水平在官方贫困线之下。就财富高度集中的程度而言俄罗斯位居全球第一^①。

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鲁斯兰·格林伯格^②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结果的评价十分

① Аналитик Morgan Stanley оценил состояние миллиардеров России в треть ВВП. https://www.rbc.ru/economics/15/05/2021/609ed42c9a7947120d6155fd?utm_source=fb_rbc&%3F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fbclid=IwAR0suBLf7ff6UwMEO-KlaVYRw12SBS3Bck2RRaMNejA8jyA50xGz_u_ODKI

② 鲁斯兰·格林伯格，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长期担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肯。他认为,俄罗斯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和形成中产阶层的政策是失败的。俄罗斯中产阶层在最好情况下也没有超过总人口的 20%,现在更是萎缩到 15%—17%,其结果是贫困人口增加,消费需求萎缩造成经济停滞。因此,俄罗斯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只是这个市场经济是反社会的、财阀统治的(плутократия)、结构简单的,且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①。

以上情况,包括严重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的经济结构以及严重的贫富分化,均指向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俄罗斯 30 年来的发展缺失^②,概括起来,就是“有稳定,无发展”。对俄罗斯而言,尤其是考虑到 2020 年的宪法修改以及未来不可避免的权力交接,这种“停滞”必然伴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四、结论

以上我们以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为视角,考察了 30 年来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基本内涵包括绩效等。初步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得以重建且不断固化,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断强化,政治发展呈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在历次总统大选和国家杜马选举中(20 世纪 90 年代除外),执政当局推举的候选人以及所谓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胜出,现任领导人长期执政,均指向连续性。有学者甚至将这种情况界定为“新世袭制”(неопатримониализм)^③。俄罗斯政治发展连续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力维持其长期执政地位的目标与俄社会大多数民众惧怕未知变革的心态相辅相成。二是政治权力的“国家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和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与民众的“父爱主义”(通俗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民众对国家的“等靠要”心理)相辅相成^④。国有或国有控股部门及财政供养部门的从业者,其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更高,构成中产阶级的主干,大量退休人员的福祉依赖国家,这部分选民更愿意维持现状。这种偏好往往被利用、被放大,进而成为主流民意。

① Ведущие экономисты назвали три главных пров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01.12.2020. <https://www.mk.ru/economics/2016/12/01/vedushhie-ekonomisty-nazvali-tri-glavnykh-provala-rossiyskogo-gosudarstva.html>

② 薛福岐:《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的困境及其原因》,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4 期。

③ Andrei Riabov. The Post-Soviet States. A Shor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Contex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ersity.

④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Стать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13>

三是选举制度的改造。在俄现行宪法框架下，政治权力必须通过赢得选举获得社会的授权与合法性。俄选举制度不断被改造，从竞争性选举逐步演变成为公投式选举，这一点在总统大选中尤为明显。选民往往被告知要在不理想的现在和充满未知的未来之间进行抉择。四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权党的工具化，使得政治权力成功摆脱二者束缚，此乃俄罗斯政治发展连续性的关键内生性因素。五是政治权力控制资本、地方势力、东正教会、传媒。六是政治权力对政党制度的改造及对政党的控制，政党被分为“体制内反对派”和“体制外反对派”并加以区别对待。

其次，从绩效角度看，单一中心政治权力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关系，足以维持政治社会稳定，但却一直没能解决发展问题。部分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经济模式可以界定为“停滞2.0”和“中等收入陷阱”^①。一般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民众的广泛参与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活力，但其后果则是有可能出现新的权力中心。面对这种局面，“单一中心政治权力”选择国家作为最基本的经济主体，同时默许大量的非正式就业和灰色经济。

因此，政治发展连续性的经济社会后果就是不发展或者发展缺失，这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俄罗斯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巨大风险。考虑到现任领导人长期执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领导人更替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此外，在缺乏社会制约的情况下，政治权力成为自身最大的威胁，政策失误将导致社会震荡。例如2018年的退休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最后，展望俄罗斯政治发展前景。可以说俄罗斯目前的单一中心政治权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管制型”互动模式能够满足大资本和依赖国家的多数民众的诉求，国家主义与父爱主义相互建构，相互强化。但是，这又与俄罗斯社会的变革诉求存在明显张力。此外，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不见得会引发权力结构的变化。目前的外部压力（西方制裁等）则有利于政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整合社会力量。以上因素使得目前以单一中心为主要特点的权力结构能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维持下去。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政治体系的发展也会在分岔点上做出新的选择。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① Застой-2: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иски 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Под ред. К. Рогова. М.: Либер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2021. С. 80.

30 ле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юз Фуци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21 году исполняется 30 лет с момента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30 лет с момента появ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в качестве субъек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С момент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тличительной черт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стало то, что "Моноцентричнос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был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а и постоянно укреплялась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обществом, а ее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жизнью постоянно усиливал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ильную континуаль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моноцентрич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и ее "регулирующая" модель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с обществом могут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ь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круп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и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людей, зависящих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татизм и патернализм строят и укрепля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явна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с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одной моноцентрич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и ее "регулирующ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общество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решить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 социальным следствием непрерыв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е развитие или отсутствие развития. Это также еще одна отличительная чер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это также самый большой риск, с которым Россия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ейчас и будет сталкиваться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единый центр;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ласть; отсутствие развития

Thirty Year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ssia: Features, Effects and Prospects

Xue Fuqi

Abstract: It's been 30 year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is year also marks the 30th anniversary that Russian Federation has bee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s a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Since the transition, the salient feature of Rus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single-center political power" has been rebuilt and continuously solidified in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ts control over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life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shown considerable continuity. Russia's current single-center political power model and its "regulatory" interaction model with society can satisfy the demands of large capital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who depend on the state. Nationalism and paternalism construct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but there is a clear tension with the demands for change in Russi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ormance, the single-center political power and its "regulatory"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are sufficient to maintain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but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solve the development problem.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ntinuit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re economic and social non-development or lack of development. This is another distinctive feature of Rus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the biggest risk Russia faces now an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Russia; political development; single center; political power; lack of development